

◀ (上接5版)

的过渡时期穿梭其间。本来王氏每逢苦闷之际，便以作诗填词排遣胸怀，为此，他个人颇感自得。惟后人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评价容或不一。但于其文学研究的成果，却众口一词，交相称誉。盖王氏创作之外，依然不改其学者习性，勤于搜集前人所忽略的素材，经考察、爬梳、阐释文学史为人所忽视的文类。前后撰成《人间词话》(1908)和《宋元戏曲史》(1913)两部开山之作。《人间词话》别开生面，抛出“境界说”，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独特的新视野，令人一新耳目；《宋元戏曲史》则披荆斩棘，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处女地。二者均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惟一旦他移情专注经史研究，便绝口不复谈此艺。一若它时放弃西学般，便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其骤变、斩决的态度如是。

必须点出的，沉浸西学时刻的王国维，他取径西学所引发的立论，动辄与固有思想有所出入，举凡他所引述的思想——“哲学乃无用之学”，之于儒家“淑世有为”(《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乃游戏的事业”，之于陈腐的“文以载道”(《文学小言》)、视悲剧价值远高于传统创作的“和谐团圆”(《红楼梦评论》)，甚至大胆综评：“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均是惊世骇俗之论，世人为之瞩目。要之，王氏毋乃意在再造文明，而非汇通中西。即便他后来在《国学丛刊序》(1911)中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其底蕴着重在开展新时代的风气，以打破保守、怠变之习，而非意在调和新旧、中西之学。

另举“翻译”事例，以概其余。缘清末西洋文化长驱直入中国，新名词，包括洋译名和日译名蜂拥而至；哲学一门尤其是如此。五花八门的新名词，令阅读群众目眩神迷，难以适应，因是卫道之志忧心忡忡，连一度是激进分子的刘师培(1884—1919)皆挂心新名词的输入，将导致民德堕落，遑论教育的当权者张之洞之辈。王国维则对“新名词”的涌入，保持开放欢迎的态度。他言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论新学语之输入》)

然而，他对国人译名颇有意见，例如：严复的中文译名若“天演”(evolution)、“善相感”(sympathy)，则颇致微词。盖他认为日译名因群策群力，比起



► “真正对(王国维)哲学的致命一击与意向的骤变，尚俟罗振玉的介入与劝导。”



藤田丰八

◀ “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盖经由藤田的熏陶。”

单打独斗的中译名更加精湛审慎，无妨多予接纳。王氏确言之有故，盖近代日本接受西洋人文学的知识比起中国更为积极，例如：史学方面，日方于1887年即延聘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关门弟子律斯(Ludwig Riess, 1861—1928)至本土，直接传授日尔曼史学近15年；哲学一门，洋人更是络绎于途，接踵而至。1887年康德学专家布塞(Ludwig Busse, 1862—1907)，也亲自执教东京大学哲学科5年。因此容易形成群聚的加乘效果，以翻译事业而言，当时的中国只有瞠乎其后可言。

原来辛亥革命(1911)之后，他随罗振玉再次避居东瀛，寄居京都，达5年之久。缘受罗氏大力规劝，转而改治经史之学，王氏遂自慰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篋中《静安文集》百余册，悉加烧毁(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按《静安文集》乃是王氏亲手底定的文稿，收集了他近年研读西洋哲学的心得，并运用至中国学问的实验成果，再附上为数不多的诗作。然而一旦他幡然醒悟，竟至弃之如敝屣，改变不可谓不大，而将《文集》焚毁不啻宣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之后，王氏乃尽弃前学，为学判若两样。

惟个人揣测王国维在1911年再次东渡日本，固然经罗振玉的规劝，方才改弦更张，毅然步上研究国学一途。但在此之前，他恐尚未放弃追寻西方哲理的念头；否则他断不会不辞舟车劳顿，将那些攸关哲学的洋书，随身携至东瀛，并暂存放京都大学图书馆。然而一旦王氏旅日既久，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求知的热忱，不歇时便会知晓其时日本西方哲学研究

的水平远非他所及[日本哲学界该时不止已迈入新康德主义的阶段了，而且进入西哲百家争鸣的状况。实言之，王国维个人所掌握的黑格尔哲学相较于该时日本整体哲学界乃瞠乎其后的。参较牧野英二著，廖钦彬译《日本的黑格尔研究史与今日的课题(1863—1945)》]；而在知己知彼之后，果要在治学上出类拔萃，善尽己之长，“返归国学”不失为正确的抉择。

总之，王国维的哲学工作或许仅止于此一阶段，固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但真正影响及日后学术的发展，却是他接受西方史学以及接轨国际汉学的机缘。居中最关键的人物，不外是其业师藤田丰八和一路栽培他的罗振玉。

王国维之接受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盖经由藤田的熏陶。藤田毕业于东京大学，该时恰是兰克关门弟子律斯赴日执教的时候，藤田一辈的汉学家不少受教于他，而受到兰克史学的洗礼。这同时是近代日本史学转化的契机。尤其当时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倾向，乃是向西方请益，而非向中国学习。而王氏最初认识兰克史学，也是因为藤田嘱其代为写序之故[《东洋史要序》(1899)]。

简之，兰克史学对日本或中国“新史学”的启示，最重要的无非是重视“原始史料”与史料的“系统”性而已。这点在藤田或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发挥得鞭辟入里。王氏就曾称誉备至藤田氏攸关中国古代棉花业的分析，其优点便是善用许多吾辈不能利用的材料，而引为己方憾事。要知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乃始自研究西洋哲学，因此

纵使有接触兰克史学，但其影响一时并不显豁。惟一旦他跨入文史领域，其作用则立竿见影。例如：他在准备《宋元戏曲史》之前，则先大量广搜材料，编纂了《宋大曲考》《优语录》《戏曲考源》和《录曲余谈》(1909)等，这或可视为兰克史学典型的进路。

另一方面，即便王氏为中国古史研究提出兼顾“纸上史料”与“地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究其实，考古学之所以引起他研究的重视，全因为文字材料发现丰富。这恰恰呼应了他一贯所主张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然而不容讳言的，王氏却依旧未得超越兰克拘泥于“文字材料”的专注，而达臻近代考古学的水平[这方面，犹俟之后的傅斯年(1896—1950)又往前推进一步，正视考古遗址于非文字方面的价值与重要性。请比较拙文《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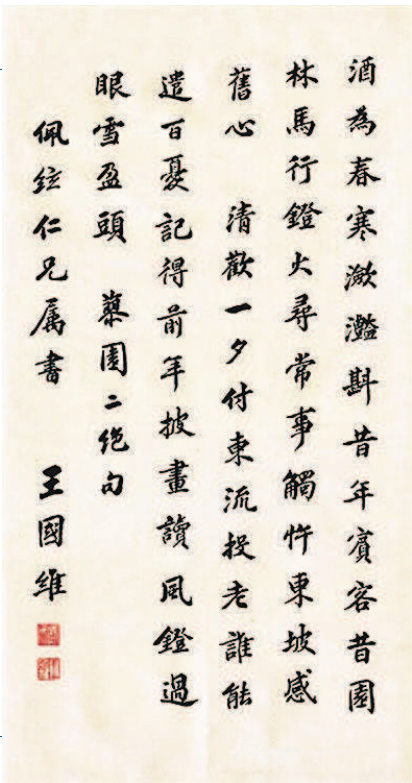
王国维步上国际汉学的另一引导者，正是罗振玉。其佐证之一，便是他少时素不喜《十三经注疏》，甫受新潮洗礼，即驰骋西学，游骑无归。此时却因罗氏规劝他“专研国学”，遂幡然一改旧习，尽弃所学；随罗氏请益小学训诂之事，并勤研《十三经注疏》，打下日后董理国学扎实的底子。这虽让他得以领会并承接有清一代的学术，却仍不足以尽道其日后绝大成就的底蕴；诚如他胞弟王国华(1886—1979)所言：“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又，王氏多年的挚友——金梁(1878—1962)，且进一步称他“尤善以科学新法理董旧学，其术之精、识之锐，中外学者莫不称之”。

另有一项因缘亦不容忽视，便是罗氏和藤田毫不藏私地引荐了王氏与日本与国际汉学界直接切磋、交流(王氏即早便了解藤田在学术交流的关键性。他在1899年致汪康年的信，便指出“其所交游固皆彼中极有才学之士，若一旦不合……彼中材智皆将裹足不为国用，此事关系非小也”)，让他接引上实时性的学术议题，一展长才。总之，毋论就原创性的见解或开拓崭新领域两方面，日后王氏均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为众望所归。末了，且援引王氏学侣——狩野直喜概括王氏一生为学特色的评论，以作为拙文的结语，他言道：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一方面在于凡是中国老一辈大儒才能做到的事，他都做得到。……可是因为他曾研究过西方的学问，所以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为可靠。换言之，他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法理解得极透彻，并将之用于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王君作为一个学者的卓越之处。[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按：狩野氏系日本汉学名家，但对本国和中国的古典研究均表不满，而有志于学习欧洲的研究法，早期问学甚受兰克史学的熏陶。在学术上与王国维时有往来。见江上波夫编著，林庆彰译《近代日本汉学家——东洋学的系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页71—78]

要之，狩野氏所谓“西方科学研究法”，意味着无非是世纪之际，被奉为“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圭臬的兰克史学。职是，谓王氏甚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说，西方哲学对王氏的影响是一时的，而西方史学方是恒久的。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



王国维书赠朱自清诗轴